

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以人本精神为基石的人类文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创造力量的民族。众所周知，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的先民却认为，这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自己发明的。这典型地反映出中华文化与古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差异：古代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天上的神灵，中华的先民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其实都是人间的英雄和氏族的首领的英雄事迹的文学表述。女娲等人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人物，分别发明了筑室居住、钻木取火及农业生产，而黄帝及其周围的神话人物，更被看作中国古代各种生产技术及文化知识的发明者。中国的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实则是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的艺术夸张。既然中华的先民们确信文化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伦的幸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在中华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尚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

民为邦本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莫砺锋

的最大多数当然就是“民”，他们是组成民族和国家的基本元素。在人类脱离群居杂交的原始社会以后，生活和生产的基本单位就是家庭。对于很早就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形态的中华民族来说，更是如此。在“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中国古代，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人们因血缘而组成家庭，再由家庭组成家族、宗族，进而组成社会、构成国家，这便是中华先民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基本认定。所以，“民为邦本”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先民们的集体观念，是先民们最早认定的政治理想。

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来看，“民为邦本”的观念产生于公元前的大康时代。在早期儒家经典《尚书》中记载了当时的《五子之歌》，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古人对夏朝走向灭亡的一种反思，也是对民本思想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在这个基础上，稍晚的周公提出了“保民”这一重要思想。周公认为要延续周朝的统治，不重蹈商朝的覆辙，就要“保民”。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民为邦本”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孔子指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意即一

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会垮掉。孟子更为具体地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下》）先秦的诸子百家也都认识到这种思想的重要性，《荀子·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用水与舟形象地比喻国家成败与民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后来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对此十分赞同，经常引用，并且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民为邦本”的思想深入人心，以至于留了不少历史故事，例如在战国时代，有一次齐国的使者来到赵国，当时实际掌握赵国政权的赵威后接见使者，还来得及拆开国书，便向齐使发问：“岁亦无恙邪？民亦无恙邪？王亦无恙邪？”使者不悦，责问说：“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赵威后回答说：“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详见《战国策·赵策》）清代学者唐德宜评论说：“前一问深得‘民惟邦本’意，后一问深得‘为政在人’意，不料战

国时母后有如许大学问！”（《古文翼》）其实赵威后的一番话语不一定是“如许大学问”，而是“如许大见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但是身居统治阶层的赵威后有“如许大见识”，连身处社会下层的民间女子也不例外。《列女传》中记载了春秋时鲁国民间的一位普通女子“漆室女”的故事。漆室女超过出嫁年龄仍未嫁人，倚柱而啸，就连平日与她要好、来往较多的“邻人妇”也误以为她是为出嫁一事内心极度痛苦所致。然而真正让她忧虑的是，“邻人女奔随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终身无兄……”，联系到“鲁君老悖，太子少愚”这个事实，那么她的忧虑就不是杞人忧天了。家不能一日无主，国不能一日无君。“三年，鲁果乱，齐楚攻之，鲁连有寇。男子战斗，妇人转输，不得休息。”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灾难。漆室女之忧何其确也。由此可见，“民为邦本”决非仅仅是古代中国的统治阶层出于管理国家的政治策略，它也是普通人民出于自身利益的价值判断。

由于“民为邦本”是古代中国的国家管理人员与被管理大众的共同价值观念，经过双向互动的意识交融，便达成全民共识性质的国家认同。它不但是中华文明早期的优秀政治经验，也为后代中国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在和平时代，它能引导人们同心协力建设国家，所以“民为邦本”的观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努力继承。

（本文转载自新华社 2022 年 11 月 29 日第 11 版）

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王永义 姜迎春

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把握守正创新，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党的创新理论的原则性和原创性，对我们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坚持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如此。从我们党成立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就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任务。

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对此作了艰辛的探索，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必须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做到守正和创新的有机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

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从这些重要论述中，可以知道，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总体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是守正。二是从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当成需要背诵和重复的具体结论，而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就是创新。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

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是前提，是出发点。为什么要守正，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迄今仍占据真理和道义的高点，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它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社会指明了方向。

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守正，不犯颠覆性错误，要做到“三个不动摇”。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

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实现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这就要求我们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二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并把我们党锻造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我们就能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三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从本源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始终坚持共产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从实践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坚持守正创新，创新是关键，是落脚点。为什么要创新？原因就在于马克思

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正是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永葆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从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实践看，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

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这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只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才能把蓝图变为现实。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一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三是必须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本文转载自新华社 2022 年 12 月 6 日第 10 版）